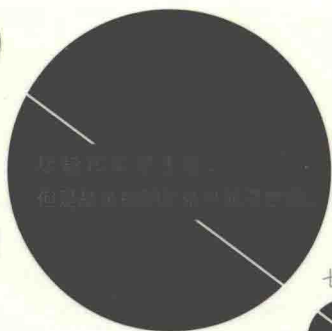


高克 著

截取顾维钧外交生涯中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的重要经历为全书骨干

巴黎和会



七七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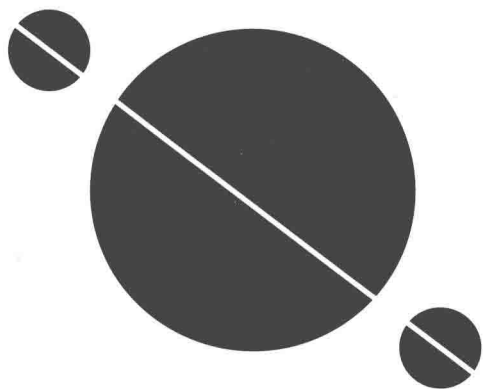
外交家 与战争

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

高克 著

外交家 与战争

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高克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408-9

I. ①外… II. ①高… III. ①顾维钧(1888~1985)-外交战略-研究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4696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设计 包晨晖

外交家与战争

——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

高克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5 插页 3 字数 238,000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408-9/D·2762

定价 40.00 元

序

唐振常

(历史学家)

近代以前，中国无所谓外交。有之，则所谓理藩是也。堂堂华夏之外，无非四夷；甚至巍巍天朝的清廷之外，亦是番邦（实际上后金正是明的番邦）。理藩理番，其事一也，承平则纳贡、朝觐，战乱则安抚、征讨。祖宗成法，千年如此，是不能变更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阿美士德号东来，诚有覬觐之心，然其主旨，则在破藩篱，建立外交关系，前者尚能见乾隆一面，后者则全然无功而返。相继碰壁，势所必然。

这种局面，靠了帝国主义的兵舰枪炮打破，其事可愤，其情可悲。又历年所，近代意义的外交事务浸假以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算是有了一个办外交的机构，而相继派遣出使大臣，算是有了驻外公使。从一种意义上说，奕訢、李鸿章以至于驻外使臣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是我国的第一代外交家，然而，他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从名义上看，所谓外务，即是洋务，亦即前于此所称的夷务。奇怪的是，近代史专家常所议论的洋务，往往多非外务而系内政。概念的混乱，当由于实际的混淆所致。这就说明，外务究竟是什么，其时也还不是那么清楚。

其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班大臣，更替频繁，责无专司。也就是说，晚清之际，并没有专管外交名实相符的领导班子。至于出使大臣，更多临事膺命，任期无常，亦少在各国之间作调动。如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三人，可算有眼光、有成就的外交家，郭嵩焘能渐明西事，知西学非只以奇技淫巧见长，其典章文物制

度实多可取，只学西方之物质是仅得其皮毛。可是，就因为他发表了这样惊世骇俗的怪论，以致不能终于外交战线，归国郁郁以终。曾纪泽出使英、法，兼使俄，修订中俄条约有成，赫然一功。回国后，尽管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为时不长；而分别参与和法、英的有关谈判，实是临时性质，本职工作实在内政上转来转去。张荫桓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多年，是一位能员，出使美、日、秘，亦有成，但也没有被任命在外交战线坚持下去，最后的结果是先被充军后被杀头。因此，可以这么说，清末，有了第一代外交家，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家。

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当始于辛亥以后之袁世凯及历代北洋政府，其中个别人物，或在清末即开始外交生活，但作为一代人来讲，其诞生当在辛亥以后。在这一代可数的著名人物中，有伍廷芳、伍朝枢、陆徵祥、曹汝霖、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等。论资历，顾维钧低于上举诸人，然论服务外交年限之长，贡献之大，则非顾维钧莫属。顾维钧于1912年二十四岁时，自美学成归国，任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唐绍仪的英文秘书，开始接触外交事务，至1967年以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兼副庭长退休，服务外交界长达五十五年，在世界上亦属罕见，可谓真正的职业外交家。就顾维钧一生所经历的诸多中国及国际重要事务而论，他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人。

研究顾维钧，是研究现代史的组成部分。长达五百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出版，为顾维钧研究和现代史、外交史研究，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高克留学日本，为博士研究生，以其长期研究所得，写成该书，卓然有识，成其系统，对于顾维钧研究和现代外交史研究，可有推进，值得欢迎。此书选择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盖以截取顾氏一生外交生涯中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此一重要经历为全书的骨干，上溯初涉外交和参加巴黎和会，下及七七事变后中国战时外交政策的转变，意欲以此而探索政治和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意义。此意可嘉，此志可取，其作非只泛泛的叙述而已，可谓为后来的研究

辟了蹊径。

我以为，顾氏一生外交生涯，在精神上的支柱是爱国主义，而其最可敬的态度，则是勇于任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是参加巴黎和会及国联李顿调查团。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时，顾氏年方而立，在代表团陆徵祥、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祖诸人中，位居后进。首席代表陆徵祥，敷衍塞责，以病为辞，临事推卸；甚而一度人也失踪了，施、王诸人亦互相推诿，不敢以理在会议力争，甚至对于极重要的一次会议——向和会最具权力机构的十人会议报告山东问题，陆、施、王均不愿参加，后来王表示参加，但拒不作报告，顾维钧勇于任事，以代表身份痛陈山东问题经过及中国态度，历时半小时，义正词严，那些强权政治的代表，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路易·乔治、外相巴尔福，都离席与顾氏握手道贺。此后，历尽艰难，代表团努力均告失败，终而以坚决的态度拒签和约，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不可欺。其间，最勇于任事者，也是顾维钧。五四运动所表现的全国人民爱国精神与顾氏的爱国精神相符合，便能临事以勇。顾氏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会上何以有如是勇气问题时说：“这很简单，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们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人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自勿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有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①正因为顾维钧深具爱国精神，且勇于任事，同样在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的全部活动中，才能不顾日人多次的威胁暗害，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于全局言，李顿调查团是失败了，所采取者是妥协的态度，此国联的使命所以然，时势所以然，顾维钧是尽了力的，不足为责。

抄一段郭嵩焘奏折的话：“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

^①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0页。

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这是当强邻压境时，郭嵩焘提出的外交之方。不幸四、五十年之后的顾维钧办外交的时代，中国仍处于强邻压境之势，顾维钧所执以处理外交之方，亦在得其“势足而理直”，“恃理以折”。此所以为明智也。高克此书，其所分析，亦得此理，是以可取，是以能有所见，读后可以明白，顾维钧处于其“势”之下所持之“理”之必然和必要。

1995年10月

序

陈 健

(中国驻日本原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提起顾维钧，上了一些年纪的国人以及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士都会对其肃然起敬。100多年前，他怀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梦想飘洋过海研究政治、外交、法律，面壁七年，历经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三个阶段。他主要在政治学院学习国际法与外交学，最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戴着博士帽回来，曾经从总统府的大门进进出出，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长期以来，国内对顾维钧的研究主要是两个视角，一是历史的视野，着重人物活动轨迹、人物思想历程的研究；二是法律的视野，重点探讨的是顾维钧的国际法思想。相反，只有很少的人从政治，尤其外交学的视野来探讨顾的外交理念以及外交艺术。顾维钧1968年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哥大（哥伦比亚大学）领得文学士、政治学硕士、国际公法及外交博士学位。”^①顾维钧自称的“国际法及外交博士学位”可以视为一个整体，没有必要进一步区分究竟是国际法博士还是外交博士，虽然严格地说，国际法与外交各有侧重，相对独立，但是“在实际上又不可强分的，所以研究外交不可不明国际法，研究国际法更不可忽略外交”^②。从顾维钧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虽然他穷其一生致力于国际法的实

① 袁道丰：《与顾少川大使谈外交——一段极珍贵的外交经验与资料》，载董霖：《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第163页。

② 刘达人著：《外交科学概论》，中华书局，上海，1937年7月发行，1941年8月再版，序言。

务,但是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政治与外交。

高克博士曾习国际法,又在海外留学过,长期钟情于国际政治与外交研究,学术背景与顾维钧相似。该书就是一本解读和诠释顾维钧外交思想与外交特点的学术专著。为了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作者选取了一个“点”——顾维钧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由此展开分析,同时旁及该点“之前”与“之后”,这样就既重视书稿的“重点性”,又照顾“全面性”,“重点”与“全面”做得恰到好处。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特色。该书的第二个特色是史料丰富。不仅有第一手资料,也有国外文献,尤其是日本同仁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可供史学、法学、外交界再利用。该书第三个特色是可读性强。书中不仅有严谨的理论分析,而且穿插外交细节、外交花絮。

至于书中所阐明的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外交技巧可能是读者更为关注的方面。

爱国主义。顾维钧外交思想中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是顾氏外交实践中坚定的理想,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故在险恶外交态势下他始终无畏,大义凛然,以民族、国家大业为重。就是身居国外,依然心系国家、故乡。他思乡之切时,便吟诵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

弱国更需外交。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弱国,所以不能单凭血气之勇,需要纵横捭阖。顾氏十分清楚政治、外交在战争中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积极开展活动,尽自己所能,虽只赢得有限的外交业绩;但即便外交失败,也赢得了他国的尊敬。现代的国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对顾维钧求全责备。

“中庸”的政治理念(超党派的外交理念)。顾维钧“中庸”的政治理念在国内体现为超党派外交,重视折衷、调和、平衡,以大局为重。这典型地体现在“主战”与“主和”论战中。该“中庸”的政治理念体现在国际上则是他对战争的看法。他厌恶战争,希望用和平达到目的,并且他对外交的作用理解得非常深刻。他认为,外交不比打仗,很难“完胜”,同归于尽不能经常用于外交。

以上谈的是顾维钧的外交理念,接着谈谈顾维钧的外交艺术。它们主要有:

依美制日。也称亲美外交、联美制日。顾维钧在美国师从国际法大师穆尔,又广交朋友,加上他深谙“均势”之道,故他知道“借力”的重要性。在他与日本的外交斗争中,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美国、英国等列强,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国联外交。又称联合国外交。对国联(后来的联合国)的作用,顾维钧是异常清醒的,然而,贫弱的近代中国只能依靠它,也是时势使然。通过出席国联的多次会议,顾氏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目的,使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道义上站在中国的一边。中国为此也得到了一定的人财物的支援。

修约外交。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研习多年国际法的顾维钧当然知道“国际法是力量与均势的产物”(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语)的真谛。故他积极奔走,修改不平等条款,为中国走向平等花费了心血。中国从巴黎和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尝试开始,到华盛顿会议,再到与各国的修约谈判,直至中英新约签署,顾维钧是惟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作为一名弱国外交代表,顾维钧领导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开辟了我国自主外交的先例。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他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更侧重于基本原则的创制,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和重视国际法应用的外交特点。之后继续开展的中苏、中比修约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更集中体现了顾维钧法律废约和外交自主的思想。

随着我国大国地位的逐渐稳固,外交显得日益重要。顾维钧的外交理念以及外交技巧对于外交官、就读外交学专业的学生——未来的外交人才启示会更为直接。

序

吴寄南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史上名闻遐迩的一位外交官。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堪称“第一”的记录。他是第一个在国际会议上与日本同行唇枪舌剑，以凛然正气和犀利辩才赢得满场喝彩的中国外交官，他和他的同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挺直腰杆对不平等条约说“不”；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组织的调查团，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东三省实地取证的中国政府代表，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李顿调查报告”的问世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他在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为奠定战后国际秩序和中国的大国地位折冲掉阖、殚精竭智，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缩影。研究顾维钧，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外交史。

高克兄是国内研究顾维钧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大家。他曾负笈东瀛，在大东文化大学攻读博士。高克兄在研读《顾维钧回忆录》的基础上，搜集了分别收藏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文件、顾维钧捐献给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外交密档以及未经整理和公开的顾维钧私人文牍，从中搜求爬梳，挖掘整理，感悟深邃，卓然有识。高克兄1995年问世的《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一书，是他长期研究顾维钧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结晶。这本书

截取了顾维钧外交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一段，即由“九一八事变”为开端，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在国联舞台上传递中国声音，与日本代表斗智斗勇的外交实践。这本书还披露了顾维钧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参与制定反对日本侵略策略，呼吁国内各政党一致御敌的经过。高克兄的这本专著以其独到的视角、详尽的史料和精湛的见解，甫一问世便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普遍好评。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一本已经问世二十年的专著能够再次付梓，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这固然表明读者对顾维钧这位“民国第一外交官”的热忱关注，也足证这本专著中显现出来的高克兄的研究功底之深，学术造诣之高。本书再次面世时充实了许多新的史料，书名也改为《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与原著主要限于介绍顾维钧的生平事迹相比，立意更高，内涵更丰富。再次面世时增加了第八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处理的国际外交”，更有画龙点睛之妙。如果说顾维钧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那段“多事之秋”的外交折冲，在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上居功甚伟，却未能阻止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华夏大地，不能不说是一部外交“失败记录”的话，那么，顾维钧在1943年后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所作所为，却是一段建构战后国际秩序和中国大国地位的外交“成功佳话”。顾维钧秉持其一贯的和平主义的理念，在与反法西斯阵营主要盟国的磋商中既坚持原则，掷地有声，又灵活应对，游刃有余，充分显示出他的外交机智与手腕。新增加的这部分内容有助于拓展和提升国内顾维钧研究的水准，也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二战后国际秩序和中日关系的来之不易。

像中日这样拥有二千多年悠久交往历史又恩恩怨怨的国家，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对。从历史上讲，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而另一方面，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选择了一条穷兵黩

武、疯狂侵略和掠夺亚洲邻国的错误道路。国势衰竭的中国成为它欺凌和宰割的主要对象。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史上,几乎每一页都留下了日本侵略者用中国人民鲜血写下的罪恶记录。顾维钧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绝大多数时间是与日本人交涉,直面其骄横跋扈、咄咄逼人的气焰,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途末日、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了。与顾维钧的时代相比,当今的世界格局和中日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历经沧桑后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日本在战败后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放弃了昔日靠武力和欺诈攫取的大部分他国领土,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日两国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先后缔结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4个政治文件,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喜人的进展。然而,日本国内始终有一股政治势力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耿耿于怀,意欲摆脱战后体制对日本的约束。这既是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隐忧,也是中日关系风波迭起的根源。近年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被称之为历史修正主义的逆流,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这股逆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日本从未对其侵略罪行进行彻底的反省和认罪,与同为二战罪魁祸首的德国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的右翼势力及其在政界的代言人拒绝承认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肢解和鲸吞中国领土的罪责,拒绝承认实施南京大屠杀、任由“七三一”细菌部队肆虐的罪孽,拒绝承认强征慰安妇、劫持和奴役亚洲劳工的罪孽。当今这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不过是集其大成者而已;其次,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日本朝野两大阵营的危机意识空前上升。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日本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持续滑坡的阴影,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国债高筑、人口老龄化等挑战,且其进出口贸易总额、GDP总额等也陆续被中国迎头赶上,在东亚地区乃至国际的事务中渐

趋边缘化。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挫折感、危机感，在极端失望和悲观的社会心态引领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日渐抬头。日本政坛出现了“鹰”派政治家煽动民族主义思潮，而民族主义思潮又强化“鹰”派政治家地位的恶性循环。再者，美国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对手，在加紧围堵中国的同时，加大了对其亚洲盟国尤其是最大盟国的日本仰仗。日本外交历来有傍大腕、与强者为伍的传统，美国的拉拢自然导致了日本少数政治家产生要与中国“搏”一把的战略盲动。

许多迹象表明，中日间的战略博弈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尘埃落定。绝不能低估日本国内这股历史修正主义逆流搅局东亚和平进程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危险。这是因为中日间的力量对比目前尚未达到足以转变日本朝野传统对华思路的临界点。日本统治阶层历来信奉“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100年来形成的对华优越感要纠正过来也非易事。而且，日本传统的战略文化是不习惯也不愿意以平等地位与对手进行交往。短视、偏执、盲目自信的岛国心态使它难以与邻国互谅互让，达成妥协。它也缺乏适时妥协、见好就收的战略文化基因。当然，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演。日本少数政治势力要想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在局部范围内可能成功，但企图倒转历史车轮则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当今世界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日本的亚洲近邻无论是中国、朝鲜、韩国，还是俄罗斯、东盟，都有长足的进步，再不是当年日本可以肆意凌辱的对象。而且，战后70多年来，和平主义思潮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日本少数政治家要想将日本变为可以对外派兵、炫耀武力的“正常大国”，势必会遭到广大民众和舆论的强烈反对，战后延续至今的“和平宪法”和“议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架构也是复古主义者难以逾越的法律和政治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本这股历史修正主义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但完全不必夸大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

在世界格局和中日关系都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今天，高克兄推出这本顾维钧研究的专著，总结前辈历史上与日本当权者周旋、博弈的经验教训，为两国关系尽快走上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以及开创东亚地区各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提供殷鉴，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有幸为高克兄的专著再次面世作序，先睹为快，倍感荣幸，匆匆写下以上文字，愿与大家分享这份学术的愉悦。

是为序。

前 言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争取世界和平，为争取中国领土主权，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战斗一生，举世公认的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博士逝世三十周年。

历史告诉人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渴望和平的信念越来越强烈了。人们无不痛恨战争，诅咒侵略者，即使是当时的许多侵略者，当他们回首战争，对于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也不会无动于衷。如参加战争的日本将领东乡平八郎，他死前曾说：“热心于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凡是经历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在民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我是恨极了战争。”从战争的记录中，我们了解了它的残酷，了解了它对世界文明的摧残。我们不能同意世界上某些职业军人的看法：“我们不过打了一仗而已，下一次再来。”今天，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充分肯定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政治和外交同样是防止、制止战争扩大化，所应当采取的重要手段。为此，笔者想通过战史和外交文献，以及战争参与者的亲身回忆，来探索政治和外交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博士十分清楚政治和外交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他说：“弱国才真正需要外交，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九一八事变”后，他尽心尽力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他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赴东三省调查。他为了国家主权，积极诉诸国联、策动外交、争取外援，作出了重要贡献。大战后期，他率

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讨论将来国际组织问题，后来又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与各国政要共商维护世界和平问题。后人对这一场战争，往往在军事方面了解得比较多，而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了解得比较少。后人也往往为抗战的史实所激动，而对外交的斗争颇多指责或知之甚少。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于何时，笔者主张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当时中国当局虽然还没有正式抵抗，而人民已经开始了防卫的斗争，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扩大为全面性的抗战。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起，至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日之间已有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对日宣战的国会咨文中也说：“世界反侵略战争，开始于1931年日本进占沈阳时。”因此，我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日本侵略者单方面的军事、政治、外交行动，更应该通过当时中国政府对事变所作出的反映和对策，阐明“九一八事变”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性，以及顾维钧在1931年至1933年外交活动对这场战争的影响。

本书不是顾维钧的传记，而是以顾维钧为线索，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艰难历程。因此，本书采用了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原始资料，如演讲、文告、条约、宣言等，意在求真。笔者采用忠实于史实的手法，对顾维钧从少年时代到成年时期，从民国初期外交官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一段经历，进行探讨和分析，特别对他从“九一八事变”到《塘沽停战协定》签订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外交活动，给与客观的评价。诸如他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在国民政府制定反对侵略的策略，以及希望国内各政党一致御敌的建议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检讨。对于如何把握和理解顾维钧的政治观点及其没有明确说明的政治主张，笔者试图通过分析顾维钧的谈话内容和私人记述等，提供一些内部材料，来回答这一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本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二十四岁的青年外交官，主要叙述顾维钧的外交前史；第二章“九一八事变”外交、第三章在国联李